

忆 文 华

黄 景 行

(浙江省图书馆, 杭州, 310007)

汪长炳教授(1926 年 6 月毕业于文华图书本科第五屆), 是我读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指路人。

1945 年夏, 我在四川璧山县一个地方报社做临时工, 担任校对、收发工作, 并准备投考大学。每到傍晚时分, 便看到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中年男士在报社前场地上推着一辆内坐婴儿的小车子, 悠闲地漫步。无意中我们互相认识了, 才知他是当时设在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系主任汪长炳先生, 因此我才得知大学里还有图书馆学这门专业, 觉得颇有兴趣, 便想去报考该校。汪先生说他们学校考期已过, 指点我去读文华, 称他也是文华毕业的。这样, 我才走上读文华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35 年后的 1980 年 10 月上旬,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期间, 我们在杭州幸会, 汪先生原来身材高大, 惜因脊椎病而佝偻。3 年后, 即 1983 年 10 月中旬, 浙江省图书馆派我参加南京图书馆祝贺汪长炳先生和钱亚新先生从事中国图书馆事业 60 周年庆祝会, 第三次见到了汪先生。

一、廖家花园——战时文华图专所在地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地处重庆市江北廖家花园。由市区牛角沱码头沿石级而下, 便是嘉陵江边。坐木船渡到江北, 循着乡间羊肠小道寻寻觅觅, 记得还要经过一处黄桷树小茶店, 走过小山坡, 最后才到达文华图专所在地廖家花园。一路上先是看到由陕南发源流到四川重庆而入长江的嘉陵江碧清的江水蜿蜒流淌; 接着望见江北远方那郁郁葱葱的群山, 近处那一片乡村田园风光。学校大门口顺着略高的地势, 门框顶上横着一个匾额, 工整地书写着“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十四个大字。进门是一条通往校内的洁静而宽绰的三合土路, 沿途

有遮阳棚架。迎面看见一栋雪白的教室墙壁上, 书写着“中国图书馆使命全靠我们的力量”、“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我们的奋斗中成功”(入学后方知图书馆三个字缩写, 也是个创造) 字样, 方方正正的大标语, 把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伟大使命——创建和完成中国图书馆事业, 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 使人读文华图专的学子一目了然。

学校规模不大, 举凡校办公处、教室、校图书馆、教师和男女生宿舍、厨房等建筑, 以及运动场所, 都设计得十分紧凑得当, 布局合理, 相距不远, 浑然一体。学校空气清新, 环境幽静, 是一所难得的读书胜地。当年文华园的读书生活是令人难忘的, 一位同班同学俞文珠后来(1967 年 11 月 17 日) 在给我的信中说: “老朋友突然来信, 你会想象我是多么高兴, 它把我引向二十年前的学生时代, 文华园的一幕幕景象, 似乎就在眼前。”

1945~1946 年间, 全校有图书馆学专业四班, 即图六、图七、图八、图九。加上档案科第五屆, 全校学生不超过百人。截至 1947 年 2 月学校迁回武昌后, 除中途缺学退学者外, 仅有图八、图九、档五共三班学生。

日本投降后, 我虽然有幸得以升学读文华, 接受高等教育, 但经济上比较拮据, 陕南家里偶而接济一点, 却如杯水车薪, 尽管力求节衣缩食, 仍需同学友好不时帮助。夏天的蚊帐、冬季的寒衣, 无一不是同学友好相赠, 自己则力求俭朴, 勤工俭学(当时称“工作自助”), 如参加为重庆市“巴县学生救济委员会”编图书目录等(该项工作具体由图七班李绪顺同学牵头) 以克服困难。时任中学国文教师的知友、学长阳石门于 1945 年由陕西洋县来信称: “日前在县逢张继君, 得悉我弟近况。《青铜时代》一书(郭沫若著), 千里致意, 甚矣, 挚爱之友情也。念世海茫茫, 生命之舟, 任风飘荡, 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港口, 端在舵手之挣扎追寻之耳。艰难忧戚, 玉人于成, 生活虽不尽知, 心境犹能仿佛。毋丧气, 毋逃避, ……再接再厉, 誓与吾弟共勉之。”他又在 1946 年 3 月 10 日

【作者简介】 黄景行, 男, 1947 年 6 月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同年 8 月, 由校方介绍, 与昌少霁、李思义等到台湾省图书馆工作。1949 年 2 月离台返回祖国大陆, 工作于浙江省图书馆, 直到退休。

来信说：“你的来信无论就文学的技巧和思想的贮蓄说，都很使我刮目相看。……你的进步是从艰难困苦、复杂异样的生活里磨练出来的结果。”

另一位中学同学张正基 1942 年来信说：“过去在重庆相处的情景，好像是昨日的事，你现在要毕业了，作何打算？你能在苦难中完成学业，精神真可佩服，我是常和友人谈及你的，因为我知道你的情形比别人详细些。”

记得初进校时天气尚较暖和，为了省钱，曾脚穿布织凉鞋，头发多日未理，衣着因陋就简，样子有些散乱。和蔼慈祥的沈祖荣老校长有一次摸着我的头，关切地微笑着说：“头发好理理了”。

那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学校食堂里仍然经常吃战时供应的黑黄色没味道的蒸谷米，有时晚上实在嘴馋难熬，偶而到附近的华新街上去吃一碗炸酱面，那算是额外打牙祭了。

从这里反映出我当时的高校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好在在重庆读书时，国共两党政治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党的《新华日报》尚在重庆公开出版发行。“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在重庆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各种进步刊物都有机会看到。友人葛如亮曾由上海交大来信询问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半月刊》是否仍在照常出版？——希望告诉一点重庆文化出版界之真实情况。这反映了我们知己同学间在校期间关心进步文化的情况，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对于认识时局有较大启发，不再偏信国民党御用舆论工具的片面歪曲宣传。

对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著名的“政治协商会议”，我感到十分喜悦兴奋，对随后发生的指使特务殴打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的“校场口事件”，也十分气愤。文华向来置身于整个争取民主，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之外，同学们一直把精力放在课业学习，过着平静的学院式生活，埋头读书。反躬自省，当时自己主观上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与行动。直到 1947 年春学校迁回武昌，一天凌晨，武大学生突遭国民党反动派军宪枪炮袭击，有几人牺牲，事后我们也只能由少数几个同学以个人身份前往表示哀悼。

值得自慰的一件往事是，一个星期日渡江进城，路过市内青年馆，见门口挂有追悼叶挺等四烈士大会的横幅，竟有幸同意入场参加追悼会，并有幸目睹了周恩来同志当年的风采，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悼念讲话。大会由董必武主持，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如孙科、罗隆基、王云五等也都先后上台讲话。

我为了准备写毕业论文《战时重庆报业之调查》，曾去访问《新华日报》社，在重庆市小龙坎下公共汽车后，独自一人步行于郊区小路，心境是复杂的，感到神秘害怕，一个年轻人去找共产党的报社，虽带有学校介绍信，却怕特务跟踪，遇到麻烦，而共产党的报馆又会是什么情况呢？心里忐忑不安。记得接待室里是挂了一张像的，可能那就是毛主席吧，可惜我当时不认识，自己向接待人员讲明了来意，对方没有多讲，只说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会给你寄去，你从中会了解的。后来果然寄来了一包各个时期的《新华日报》，毕业论文也完成了，至今还珍藏了一张当年用四川黄土纸印刷的《新华日报》。1947 年春，时任汉口《华中日报》主笔兼文华图专教授的汪应文先生将此毕业论文发表于《华中日报》副刊“图书与文献”。

这一切以及本文后面所述的经历，如参加香港“持恒函授学校”、学习老解放区进步文艺作品及进步社科著作，从而为向往解放区，渴望新中国，于解放前夕决心离台返回祖国大陆，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重庆读文华期间，还有令人难忘的一段往事：1946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我再度拜访了当时由昆明西南联大迁回北平途经重庆的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先生。承蒙先生题书“书囊无底”，下款云：“金印同学两度来访，感其纯诚，书此勉之。卅五年八月，重庆。”那时在重庆校园里课余生活也挺活跃，尤其在傍晚时分常会听到萧约翰同学那质朴嘹亮的《茶馆小调》。

1946 年下半年，我由学校安排，实习于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重庆市图书馆）。该馆地处渝市两浮支路，靠近复兴关。一起参加实习的同学有李思义、萧约翰、熊长泰等四五人，食宿都在馆内。除夕之夜，当时已就职于该馆的李永增老师，热情地邀我们到他家吃年夜饭。

二、学校复员武昌昙花林文华图专旧址

1947 年 2 月 25 日晨 8 时许我同部分同学一起乘轮离渝东下。山城隐入浓雾中，不禁让我对旅居数载之第二故乡倍感依恋。经过三峡，二十七日船出宜昌，豁然开朗。二十八日到达武汉，顿见江面十分宽阔，蜗居山城数年，首睹武汉三镇雄伟博大气势，叹为观止。

当时的武昌满目荒凉景象，日寇疯狂轰炸的残迹犹存，一些钢筋水泥的大楼残留着柱架，下面堆满瓦砾。不过蛇山下的老街还十分热闹，我常和同学

于假日或黄昏,爬上蛇山,一直漫步到黄鹤楼边,观望大江东去的宏伟气势。古楼矗立在蛇山悬崖边,脚下便是滚滚长江,眺望对岸龟山,水天辽阔,武汉三镇尽收眼底,面对大好河山,感慨万端!从历史上的三国争雄,曹操带领数十万大军直下江东,横槊赋诗,不可一世,随后火烧战船,全军覆没;到近现代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黄鹤楼下演出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悲喜剧。

学校复员回到武昌昙花林(即崇福山街二号)后,由于学生和教职员人数较少,一切设备是节约型的,教室、宿舍房屋设置比重庆更紧凑。武汉市区内占地面积自然比重庆郊区更有限,所以文华图专可说是一个袖珍型的高等学府。当时感到地方虽小而不显拥挤,房舍不多,自然感到宽畅。在重庆廖家花园学生宿舍里是上下两层粗糙的木床,武昌昙花林是洁净精致的铁床。武汉是著名的火炉城市,而我们当时住的两层楼房宿舍里却四面通风,不但不觉得闷热难挡,反而感到十分凉爽,真是意想不到的美事。

由于原文华大学和由文华大学图书科独立出来的文华图专都在同一条街上,所以这条街被称为“文华街”;甚至街上有一家善于做生意的烤饼店,也以文华为品牌,取名“文华饼”,可见文华影响之广。

在武昌昙花林文华图专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仅有短短的五个月,但却永远值得回忆。为了扩大知识面,在图书馆学专业之外,我多次安排时间前往文华附近的华中大学(即原文华大学)旁听中国先秦哲学等课程,得益良多。

1947年夏,当时与我同班毕业的女同学有:吴宝珠、彭美莲、胡文琼、张良知、黄粤生、杨海珊、刘贤瑞、温愍、黎宝金;男同学有汪柏年、熊长泰、李思义、萧约翰。据我所知,吴宝珠工作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彭美莲工作于香港中山图书馆,胡文琼工作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李峻聆工作于中山大学图书馆,汪柏年工作于文华图专(后转入武大图书馆),熊长泰工作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图书馆。1947年8月,图六班毕业的昌少骞学长、李思义和我同时由学校介绍到台湾省图书馆工作。萧约翰工作于陕西省图书馆。

三、授业解惑 学无常师

沈祖荣校长是一位正直慈祥、父亲般的长者,也是一位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中国图书事业的前驱。他兼教授西文编目、标题法(主题标引法)。

徐家麟教授教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经营。毛坤教授教目录学。李泳泉教授教英文。汪应文教授任训导主任。孙德安老师负责实习。其他还有李永增老师、沈宝环老师、梁建洲老师等。

老师们不仅在校进行课堂讲授,即使学生毕业出去工作了,也继续通信给学生谆谆教诲。比如徐家麟教授1947年9月14日由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当时他已离开文华教职)回信给我说:

昨日再得手书,甚欣!……你毅力坚强,今日修完文华课业并已到台湾省图书馆服务,实可喜可贺。来函告知台湾省图书馆情状,对于馆方在分类编目及其它技术等事上积重难返,因陋就简,难以改善之类情事,实为到处一般情形,弟方当尽其在我徐图改革是上策,一则弟在校学习无多,经验毫无,一则言改革,事实上行政上当实有其困难之处,弟当于工作上求学习,对各细小问题悉心研究,并做好随时记录研究心得结果,积久必获得进益甚多,至于人事上行政,不在其位,可不谋其政。

关于所询之问题,凡非用罗马字母(即俗所谓英文字母)之文件书刊,在排片时,只得两方法:一是分别排列,如斯拉夫文、波斯文、亚拉伯文等均各自成一序列;另一是均依各该文字读音法用罗马字母(即英文字母)音译成英文字样,此是所谓音译法(Translation),用此法音译出后,混合排列,除此之外,并无它法。

关于作音译,此事并不易办,最好由通晓各该文字之学者,照应得之语音译出之,无此语言学识训练者不能胜任此事。弟如欲知此事皮毛,如馆中有《A. L. A. Catalog Rules》《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条例》一书,在此书后附有此种语文音译对照表,可翻阅研究一过,看能有所得否?……

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8月间,时任武大图书馆系系主任的徐家麟教授来杭参观游览,住在浙图。我向他详细地请教了专科学目学问题,得到中肯的指导,特别嘱咐勿贪大贪全,勿分散兵力,分成好几篇随时整理发表,以求免得走弯路,且须征求客观上反映的意见。编著内容的精力不要偏于专门学科本身,应注意目录学方面的工作。

徐家麟老师的指导,与北大图书馆学系刘国钧教授的意见不谋而合。刘国钧先生于1956年6月9日赐信中曾指出:“既是专科学目学,当然要结合一门学科,但是在那门学问内不要钻到它自己的小问题中,主要是要知道那门科学有有什么著作,哪些好,哪些坏,哪些合乎科学研究用,哪些合乎普通阅

读。每本有价值的书都解决了些什么问题,某些书在研究什么问题时特别合用,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总而言之,专门目录学家并不要成为那门科学的专家,而是那门科学的书籍的专家,对象仍然是书。从这方面看,并不是要做两门专家,而是把科学和目录学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专业。这里没有对立问题。”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并非只有在课堂上给自己授过课的老师是唯一的老师,而是只要曾经向他请教过(面授或函授)的,便都是自己的老师。上述刘国钧教授便是我写信向他求教的(一年后我们在北京会面了,也曾当面求教于他)。当年读文华时虽未曾直接听过皮高品教授的讲课,但后来在工作岗位上曾有机会在武大拜访过他。他在1982年6月16日给我的信中说:

景行同学,我是1940年到1944年在文华图专任教的。你所提出的问题说明你对《中图法》编制的过程还不大清楚。《中图法》是以《中小型法》为基础略加改动的,我在自传中涉及到这点,现抄下:1956年在北京图书馆开会讨论《中小型法》的问题,会议首先分三组进行讨论,提了方案,然后由三组集体进行研究。杜定友先生任第一组组长。我编有《新中国图书分类法简表》,其中绪论约两万字左右,交给杜、刘两先生审阅,作为我对编制《中小型法》的意见。会议讨论结束,大体上依据我的《简表》确定大类类目和次序。只是1.把历史排在经济的前面;2.把物理科学一类分为:数理科学和化学,地质、地理科学两类;3.技术科学类分为:医药卫生,农业技术,工业技术类;4.把基本序列四分改为五分。2、3类的修改是对的,1、4两类我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这样的修改,并且在《绪论》中我已写明四分是根据毛主席知识的分类和恩格斯科学的分类拟定的。他们的分类根据物质运动形态把一切科学分为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是以物质运动从简单的、低级的到更复杂的、高级的发展规律为依据的。图书分类法的对象是图书,根据图书分类法从总到分,从一般到个别的编制原则,这个基本序列就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三类之外,还有一类依写作形式或体例编制的综合性图书,一共四类,即四分,四分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中国法》是由三十六单位的专家们开会讨论集体编制的,对上面所说的体系又作了修改,把历史排在社会科学的最后,把政治排在经济前面。我是《中

图法》的顾问,开过几次会,一次也没有要我参加。我用书面形式提过两次意见,不起作用。因此在接到第二版《中图法》后,我看过一遍,觉得有很多漏洞。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评文,从思想、学术、技术三方面指出它的错误和缺点。因它是关系全国图书馆的一个问题,拟交由书局出版,但不知有没有书局愿意出版。……

老师不一定是狭义的老师,当出现难得的老师机遇时,机不可失,千万要紧抓不放,诚恳地向人家求教。比如1948年5月15日,我的日记云:“参加台湾图书馆馆内例会时,闻洪有丰先生即将任职本馆,喜甚;此后当随时向其请教有关图书馆问题也(洪先生系国内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同年5月25日日记云:“上午,与图书馆学界老前辈洪有丰先生相谈甚洽。”5月28日,“午间与洪先生谈编制笔名索引问题,他指示用卡片随时收集新资料,古今著作均可包罗进去。并勉励我做笔记,凡经验心得都记下来,演绎之,归纳之。他预告将写一部图书采访方面的书,偏重于具体应用,如怎样采购旧书摊的书,怎样买线装书,以及怎样买普通出版家之新书等。下午,参加欢迎洪先生茶话会,并听其讲演。他特别强调图书馆员的服务精神、对待读者的态度,以及学识进修。”

又如1948年春,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向达到台湾图书馆和台湾博物馆参加一项文物展览和学术活动时,我曾向他们请教。我曾在《读丁玲〈入伍〉》这篇作业(系业余参加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文学科作业,指导老师:邵荃麟、葛琴)中写道:“《入伍》是继《我在霞村的时候》之后阅读的。……其它如严齐的长篇《一个人的烦恼》,……它们都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缺点的作品,晋陀的《结合》也是。单以丁玲的《入伍》和晋陀的《结合》相比较,我觉得《入伍》不及《结合》,因为它只刻画了知识分子的缺点,未曾暗示读者以更多的东西,怎样在生活实践中去克服或修正这些缺点?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也许是这篇作品的微疵吧。”钱钟书先生看过这篇作业后,在“未曾暗示读者……”这句前亲笔加一个“而”字,即“而未暗示读者以更多的东西”,“而”这个连接词在该句中是很必要的。史学家向达先生也亲笔给这篇作业修改了两个字。作业中写道:“自己打算用对照的写法,刻画两种绝对相反的性格:一个留恋过去,幻想未来,忽略现在;另一个则批判过去,执着现在,追求未来……”。向达先生将“执着现在”中的“执着”二字,修改为“正视”,便十分明确了。钱钟书先生又将

作业中“终于进入象牙之塔,被时代遗弃”改为“终于避开象牙之塔,被时代所遗弃”。“进”和“避”一字之差,意境便大不相同。“所”字用在动词前表示被动。这个“所”字加得十分必要。由此可见,作家、语言大师们对文中用字多么精致。

只要自己有诚心去学习,大作家也不吝赐教。记得1957年六月份出差北京图书馆期间曾向茅盾先生致信,希望去访问他,并向他求教。二十一日八时半在北图俄文编目组,忽听我的电话,话筒拿起一问,对方说是“茅盾先生这儿”,真是高兴极了:叫我九时到那边,并详告汽车路线,地址。我连忙赶去,到达已九时过十分。

进入人民出版社,经小花园,茅盾先生的秘书已出来迎接。我受宠若惊地坐在雅静的客房,久所渴望的茅盾先生步下楼梯,身着中式对襟长袖白布衫和白布长裤,我急上前握手拜见。先生和蔼可亲,亲切地问及浙江文物搜集保护、外文购书经费等问题,还问起张宗祥老馆长、陈瑜清先生。随后我向他请教关于学习中国文学问题,得到满意的教导启发。他说,从古到今,从源到流的学习方法是好的。第一步读各代总集,如《诗经》、《尚书》、《昭明文选》等。第二步,读别集。要有重点地读,都去读时间精力不许可,亦不重要。选重要的读,随读随做笔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一部读书札记,其中兼有自己的见解。第三步,专题研究。在阅读总集、别集的过程中,自然会发现自己对某个作家特别有兴趣,此时即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除了研究作家及其作品,还要研究他是受谁影响,并影响到了谁?与之有关的这类资料都要涉猎。古人治学虽不知索引的科学方法,但他们的读书札记却相当于索引,如《日知录》中与文学有关的中国哲学思想,哪怕一点一滴也要搜罗吸收。中国史学也得相应学习。

最后请他赠送手稿给浙江图书馆,他欣然允诺,并说他一向对稿子不在意,中国出版家一向不重视原稿。他谦虚地说写小说时就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作

品能有几年寿命,从来也不再向出版社要回原稿,交去出版了就算了,像《子夜》原稿都没有了。

这次会见中我曾表示想编他的年谱,打算到他的故乡浙江桐乡县乌镇去访问,茅盾先生当时表情很高兴,他说:你去要找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行。(注:1961年7月中旬,开始着手茅盾年谱的资料收集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曾托陈瑜清先生将年谱稿寄给茅盾先生审阅。后由他的公子沈韦韬先生于1978年11月11日书面详细指出错漏。他认为参考性材料搜集不少,是一特色。但由于笔名掌握不多,所收著译文章资料尚不完整,解放后的内容不够简要。由于内容质量不足,故未问世,仅将其中部分资料另编成《茅盾著译图书系年》,由浙江桐乡县乌镇茅盾故居内部印行。而《茅盾研究参考资料》,由于经费无着,未能印出。)

此后,我在与南京图书馆老专家钱亚新先生,以及武大信息管理学院彭斐章教授、谢灼华教授、北大信息管理系朱天俊教授等人的往来学术探讨中,都得到过不少教益,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图书馆工作的实质即是知人知书,其中当然包含“知人论世”。要努力了解读者与了解图书,向不同读者提供其必需的图书资料、情报信息,那么,图书信息工作者本身,首先必须不断积累、充实、扩展知识面,争取成为精通某门图书信息的专家。为了响应文华母校向同学们提出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全靠我们的力量”、“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我们奋斗中成功”的庄严号召,从入学文华之后,我即着意努力学习,不仅系统学习本专业知识,还见缝插针,到附近综合性大学旁听感兴趣的其他学科讲座。后来到了图书馆工作岗位上,不论馆内馆外,只要有机会,无不勤学好问,向人家诚心诚意地求教,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总的目标只有一个:“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我们奋斗中成功”!

(收稿日期:2007-05-29)